

《孽债》的创作，也有故事。一次去昆明出差，叶辛听闻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上，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女子，始终在屋檐下徘徊，喃喃自语着后悔与懊恼。而后发现这是位知青，在回城时离了婚，遗留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。而回到北京后再度结婚却一直没有孩子。回到版纳找寻，却怎么都找不到她日思夜想的儿子。因何最终小说写的却是上海与西双版纳的故事？

这当然也与从上海前往云南的知青很多有关。“上海是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，西双版纳是干湿两季的山地气候。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，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。”除了环境、建筑等等的反差以外，海纳百川的上海人，与版纳由偏远蛮荒、瘴疠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这一百年史，种种对比，都能为小说增色。当然，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叶辛本人写到的“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、离婚手续简单，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异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，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、爱情和婚姻的双方，到了大返城时，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”。

小说中，像美霞这样的小姑娘初到上海，会寻找怎样的父亲？叶辛说，安排美霞的父亲沈若尘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，是杂志社一个能

干的编辑，回到上海后又成家、生子……总之，他是回到了一个貌似正常的上海社会环境、家庭。这当然是一代上海知青中大多数人——无论他们在塞北还是南国，睡梦中曾经梦到过的生活。可叶辛又抽丝剥茧，将知青岁月中的往事，通过几个孩子到上海寻亲串联起来。“爸爸一个家，妈妈一个家，剩下我自己，好像是多余的。”当电视剧播出时，这句话也依然如小说般充满了人性的张力。

好人叶辛

除了在中国作协、上海市作协、文联担任职务以外，叶辛还曾担任过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在担任文学所所长期间，叶辛也曾撰写科研论文。然而，当记者问及此，叶辛首先提及的是在所长任上，“我主要是当所长”。叶辛说：“我主要是两个语言：一个是‘大哥、二哥、麻子哥’，还有一个是‘你好、我好，大家好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研究古典文学的，你不要说人家研究外国文学的不好；你研究外国文学的，你不要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好；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，也不要说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没用。”叶辛站在所长这样一个管理者、服务者的角度，用从贵州村寨得到的人生经验，平实又富有生活气息的语句，

将文学所的氛围调和到相当兴旺的状态。

当时，叶辛告诉文学所的同事，“有作为才会有地位”，同事间互相抬举，互相帮衬，出了成绩，才能受到重视。

叶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经历了国家一路的成长、发展。少年时代，在徐汇中学读书时，他的同学中有富家子，也有当时附近南平民村、北平民村的城市贫民子弟。他也跟要好同学去过那毛毡搭棚的居所。因此，当读到一些中外文学著作时，少年叶辛会感同身受那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也正因此，在回到上海后，他不忘贵州。近日，叶辛在贵阳筑城广场路边音乐会上曾动情地讲道：

“我的籍贯是上海，可我的青春，我的情怀，我的人生之路，我的牵挂，很大一部分在贵州。我是上海人，也是地道的贵州人、贵阳人。”对外推广贵阳路边音乐会，包括在惠水县好花红村参与文化公益项目叶辛好花红书院，都展现出他的乐于助人。

在回答记者参加有关“申光计划”丛书之际为何采用“岁月随笔”的方式时，他也讲到，因为几年前后辈作家林影曾在多次采访他之后，写了一本《叶辛传》，并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他希望不要重复出本人传记作品，其实颇有提携后辈之意……